

#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沙汀的影响

邓 利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沙汀产生了双重影响,决定了沙汀的政治身份和启蒙主义的文化思想。这种影响反映到他的创作中,使沙汀的创作兼具意识形态与思想启蒙双重价值诉求。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通过两条路径对沙汀产生影响的,其一,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党人及其活动;其二,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沙汀;影响

**中国分类号:**I210.94 **文献标识符:**A **文章编号:**1003-7225(2019)02-0034-07

**DOI:**10.16142/j.cnki.gmrk.2019.02.007

沙汀出生于1904年,1911年在家塾发蒙,1916年随舅父的部队四处流动,1918年结束动荡的生活,回家继续读书。1922年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夏毕业。如果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间定为1915年至1927年<sup>①</sup>。显然,沙汀未能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参与其中,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沙汀的政治选择和文化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浸染到沙汀日后的文学创作中。

## 一、政治身份的确立

沙汀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于1922年。当年,沙汀借助舅父的关系到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进入学校半年左右,沙汀补上了因生活在闭塞的家乡而被隔绝的“五四”一课,学校的教员、同学和氛围让沙汀开始全身心地接受社会主义新

思潮的冲击,沙汀开始由一个落伍的绅士子弟向一个时代青年过渡。

根据沙汀回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好,校风淳朴,又是原早低级师范的后身”<sup>②</sup>,当时教员们很多都是成都知识界的名流或高等学校的老师,水平很高。在这些教员中,对沙汀产生影响的是教国文的袁诗尧与张秀熟。张秀熟说:“我教过他们国文,除了教科书,我还自选《新青年》这类刊物的文章,选现代文学作品,那时沙汀这些学生已经不爱只听古文了”。<sup>③</sup>张秀熟和袁诗尧不是一般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他们是四川最早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张秀熟于1913年进入共和大学中学部读书,这所学校是同盟会员在成都创办的,“一入校就受到革命气氛的影响,参加国民党组织的各种活动”<sup>④</sup>。袁诗尧早在1916年就参加张澜招募的护国学生军。在1919年

**作者简介:**邓利,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间,学界存在分歧。本文依据美国学者J.B. 格里德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的划分。

②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③赖芳杰:《中国文坛“双子星”:沙汀和艾芜在成都的同窗岁月》,《华西都市报》2017年3月22日。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绵阳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绵阳文史资料》第20辑(内部资料性图书),2002年,第22页。

五四运动期间,张秀熟和袁诗尧都积极参与与组织领导四川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分任四川省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成为四川学生运动的领袖,共同领导了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袁诗尧率先向全校宣读有关五四运动的详细报道,倡导并成立“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带领同学上街宣传并通电全省,联合各大中学校师生罢课、游行和集会,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组织群众到督军署和省长公署请愿,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两人都受到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王右木革命思想的影响。1920年上半年,王右木曾邀约张秀熟等人到他家里座谈,给他们讲解军阀割据和封建势力统治的危害,结合四川情况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两人在学校多学习马克思主义,鼓动他们毕业之后回到家乡改造乡村,组织一种势力,造一番新局面。王右木还约张秀熟和袁诗尧谈心,分析自己对五四新文化的看法,给他们预测发展趋势。张秀熟和袁诗尧1921年一起到南充县立中学任教,他和袁诗尧接受王右木委托,积极推销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参加吴玉章在学校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在王右木的引导、鼓励下,张秀熟和袁诗尧相信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救中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对沙汀的政治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沙汀的两位同学:张君培和周尚明。张君培原籍涪陵,父母双亡,只身流浪到成都。刚到成都时,张君培在成都高等师范做校役,做工的同时在该校师生主办的夜课学校学习,期间得到王右木的辅导,最后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以说在故乡尽管我也听到‘巴黎和会’和‘二十一条’,乃至‘火烧赵家楼’。还见到过印有袁世凯头像的纸币,以及一副谐联:‘头儿剃得光光,小民都无发矣;银圆使成票票,总统其有脸乎?’可是直到通过他,我才逐步理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我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爱好社会科学,注意当代社会问题,都同他分不开。而他之对这些问题的钻研,则有赖于王右木对他的帮助。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还有少数秘密流行的‘禁书’,以及一些抄稿。他不止于钻研社会

问题,还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经常在谈话中进行宣传。而且往往和一些思想保守,以及少数认为他出身微贱的同学进行论争。<sup>①</sup>沙汀自结交张君培后,接受新思想的愿望非常迫切,乃至放假都不回灌县舅父家,而是同张君培一起留校读当时的进步书刊。在张君培的引导下,沙汀还把舅父寄给他的呢制服、皮鞋、自行车搁置不用,学着穿斜纹布衣,踏草鞋或便鞋,不用洋袜用布袜,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做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青年。周尚明比沙汀低一年级,但沙汀认识周尚明时,周尚明已经入党,而且还是成都市共青团的领导成员。周尚明的家景比较清贫,父亲是个裁缝,因此周尚明寒暑假都很少回家,而是同其他几位由于路途遥远、往返十分不便的同学,一道留校生活、学习。在校期间,沙汀除了和艾芜、张君培交往甚密外,和周尚明也相处得十分密切,尤其是在校的最后一年。1927年,周尚明成为沙汀的入党介绍人。

受上述这些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老师和同学的影响,沙汀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了各种进步活动。1922年,沙汀参加了由王右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的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的活动。沙汀和同学们直接来到省议会,议长熊晓岩、副议长曹叔实都躲避,沙汀和部分同学立即冲到熊晓岩的公馆里去,想请他到省议会同群众见面,求得教育经费得到合理解决。熊晓岩躲避在外,于是沙汀和同学们捣毁了熊晓岩家的豪华家具。沙汀还参加了学校进步人士组织的抵制日货和由成都青年会提倡的“平民教育运动”。“当日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李璜、曾琦的国家主义派也早已出笼了。他们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而在省立师范,我们则经常同一批‘哈巴狗’唱对台戏”<sup>②</sup>。“我记得,就在参加平教工作之后,艾芜离开四川以前,我们和其他两三位同学,还联名发表过一张油印宣言,表示向旧社会‘宣战’”<sup>③</sup>。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沙汀还上街教过几次课,听课的人中有小贩、苦力还有家庭妇女。沙汀教他们认字、看报,通过这些活动贴近底层人民。参加这些活动之后,沙汀领会到了“五四”精神的真实含义,真正透过它表面繁华的雾罩,了解到成都当年一般贫民的疾苦。在袁诗尧

①沙汀:《沙汀文集》第十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②沙汀:《沙汀文集》第十卷,第44页。

③沙汀:《沙汀文集》第十卷,第40页。

的带领下,沙汀和艾芜一起撰写稿件、油印资料,在学校散发这些文学小刊物,后来又走出学校到社会传播这些刊物。沙汀在学校其间参加的进步活动为他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1927年,沙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安县第一位党员。随后,沙汀根据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刘愿庵的安排,回到安县进行革命活动,筹建安县国民党县党部,并协助主持安县团务干部学校。

沙汀开始写作是1930年,正式发表小说是1931年。也就是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沙汀在正式将文学视为终身职业之前,已经具备了作家身份之外的另一种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他在正式从事文学创作之前,已经深入到基层社会进行了切实的社会活动,是革命活动的实际工作者和执行者,而非理论的宣传者和“制造者”。以此而言,沙汀的政治身份与同时期其他左翼作家有着较大的不同。对政治的选择和中共党员的身份使沙汀在创作之前就设置了创作的目的,决定了沙汀在文学创作中的角色和选择,决定了沙汀创作之初就是以革命者的价值观介入现实,使他的创作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顾及文学作品的现实有效性。我们可以从1931年11月29日沙汀和艾芜给鲁迅写的信中看到,沙汀在创作之初就将文学视为自身参与社会改革与革命的途径,“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气力,毫无意义的”<sup>①</sup>。即便是在收到鲁迅的回信,指出“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sup>②</sup>的指导下,沙汀也只是很少写知识分子了,依然执着地写革命题材,就算是对革命题材不熟悉,从报纸等二手材料拿来也要坚持写革命题材,“我就很少写知识分子,转而从报上和其它方面搜集一些传闻,如有关红军的、苏区的、‘一·二八’战争的,等等,写政治的题材了。只有《孕》等二三篇是以知识分子

为题材的,因此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航线》,收入的主要是反映红军、苏区、‘一·二八’等的作品”<sup>③</sup>。沙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想表现的主题是“反映大家欢迎中苏复交”<sup>④</sup>,作品在知识分子的感伤情绪中生硬地加入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的时事思想,充分反映了沙汀的政治倾向。

《法律外的航线》出版于1932年,这是沙汀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入的是沙汀1931年4月至1932年8月创作的12篇小说。从题材来看,多涉及当时影响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撤退》反映“一·二八”战争中反动军队的不抵抗政策。作品积极配合重大的政治运动,都是与当时的现实斗争相关的政治题材,比如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肆意横行和苏区的土地革命运动(《法律外的航线》);描绘军阀、军警疯狂“剿共”的白色恐怖(《恐怖》);反映农村的破产和动荡(《风波》)等。沙汀凭着政治热情,执着于革命题材,而自己并不熟悉这类题材,大多带着先入为主的意念,造成这时期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程式化倾向,人物形象模糊,情节单一,属于印象式创作。这种创作倾向在当时便遭到了茅盾、韩侍桁等人的批评,“只有社会的表面的观察。因此他描写出的,完全是社会的现象,与真实的生活的图画就有天壤之别了”<sup>⑤</sup>。沙汀本人也在后期表达了对早期创作的不满,认为“这时期我在创作上的主要意图是:反映当时的土地革命运动。但是,由于我没有直接投身在这个伟大运动当中,只是间接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和它在一般社会上激起的反响,这就大大限制了我的意图的实现。因此,我在这一时期写的作品,从我现有的水平来看,它们一般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概念化倾向,……严格讲不能算是小说”<sup>⑥</sup>。沙汀意识到“多是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而成的。正惟其如此,写起来吃力不必说了,最主要的,是颇难于写出一个压秤的人物”<sup>⑦</sup>。就在沙汀抛弃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转而将眼光投向四川,写我比较熟悉的川西北偏远城镇”,“不但写起来顺畅,

①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②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第62页。

③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第70页。

④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第69页。

⑤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第269页。

⑥沙汀:《沙汀文集》第七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⑦沙汀:《沙汀文集》第七卷,第34页。



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点创作个性”<sup>①</sup>之后,也没有忘记表现“反映时代冲击圈内的主要生活斗争”<sup>②</sup>,他依然站在明确的政治立场上进行文学叙事,执着于揭露社会的黑暗,丑化与嘲讽统治阶级以权谋私、国家意识缺失。《在其香居茶馆里》揭露国民党基层政权在兵役问题上的黑暗。《灾区一宿》《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揭示北川灾情的真实情况,为红军正名。《战后》对当政者所发动的战争给予强烈的批判。《代理县长》《丁跛公》《防空》等小说则对国民党基层官僚进行讽刺和揶揄,揭露国民党官员的丑恶本质和日益腐烂。《老烟的故事》“反映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在其统治区发动的反共高潮”<sup>③</sup>。与《法律外的航线》中的作品相比,此时沙汀的政治倾向并未减弱,只是转变为深沉了。这种深沉体现在,沙汀既写出了小说中人物意识的转变过程,又写出了这种转变的基础,并由此论述革命的可能性。这突破了之前沙汀以作者的声音和作者一厢情愿的意图来改变人物意识的生硬笔法,也突破了过去仅仅论述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不足。《醉》中的大圆,沙汀在写他的转变时,写出了引发他转变的原因,通过大圆思想意识的转变,又达成了革命合理性和可能性的表述。

## 二、启蒙思想的形成

沙汀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不仅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还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由此孕育了启蒙主义的萌芽。“我喜欢郭沫若的诗歌和鲁迅的小说,鲁迅的《故乡》几乎能背下来。我学会了思考问题,开始探求人生的意义”<sup>④</sup>。引导沙汀接触五四新文学的人主要是艾芜。艾芜还在高等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大量阅读《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到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高年级的同学筹办《繁星》诗刊。艾芜总是千方百计阅读创造社出版的刊物,他在校时读的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创造社的。就是后来到云南

昆明、缅甸仰光,创造社对艾芜的影响都占有重要位置。艾芜常说,他的思想是跟着创造社转变的。在四川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艾芜还参加了演出成仿吾剧本的活动。艾芜读了创造社的书籍之后,常常和沙汀展开讨论。在艾芜的影响下,沙汀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的作品,艾芜回忆说:“沙汀与省一师其他同学一样用功。他不仅搞功课,还在课余找有新思想的文学书来读,这就与别的同学不同了。为此,我们接近起来。读创造社的书,读《小说月报》《语丝》。我买不起,沙汀听说书到了,便跑去买来,他看我也看。商业场上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专卖上海、北京的书。还有一家书店卖泰东书店出的创造社的书。商务出的书,是在青石桥街上。我们经常一块跑去翻看新书”<sup>⑤</sup>。沙汀最早读到的白话诗,有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开始是读康白情的《草儿集》,感觉十分新鲜,大异于我过去读过的唐诗”<sup>⑥</sup>,这些新诗引发了沙汀对新文学的兴趣。在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作品中,沙汀尤其喜欢郭沫若和《女神》以及鲁迅及其作品,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打开了沙汀的眼界,培养了沙汀的文学兴趣。“而我至今尚能背诵一些篇章的,却是郭老的《女神》,因为它使我在思想感情上起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真正接触到了时代的脉搏”,“从此,凡是刊载有郭老文章报刊,由他主编的刊物,从《创造月报》到《文化批判》和《洪水》,我都要买来看。当时成都市有个商业场,其中有一家专门出售五四以来涌现的书刊,叫‘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一位姓陈的经营的,就常有我的足迹”<sup>⑦</sup>。沙汀多次回忆到“华阳书报流通处”买创造社的书刊的事情,“买书是在商业场里陈育庵开的‘华阳书报流通处’,专卖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刊。陈为四川做了好事,可惜后来赶船淹死了。我每星期至少要跑那里两次,买书、看书。《创造月刊》《创造周报》《未名》《莽原》以及后来的《语丝》,往往一到便抢光。商务用‘共学社’名义也出了些好书,如俄国戏剧

①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第89页。

②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第13页。

③沙汀:《沙汀文集》第七卷,第40页。

④沙汀:《沙汀文集》第十卷,第4页。

⑤吴福辉:《沙汀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61页。

⑥⑦沙汀:《沙汀文集》第十卷,第7页。

集、小说集,都是名著,耿济之、耿世之译的”<sup>①</sup>。沙汀被《女神》狂飙突进般的激情所震慑,被冲决一切罗网的反抗精神所打动,“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神龛之中做甚神像”这些表现生命自由的句子,沙汀倒背如流。对于鲁迅的《故乡》,沙汀多次回忆说,“另一个叫昌福馆,那里有个‘普益书报阅览室’,陈列有市场上已经绝迹的久负盛名的书刊。我记得,鲁迅的《故乡》,我就是在那里读到的,当时《呐喊》尚未出版。因为有位同学,对它赞不绝口,可我读了两三遍才读懂!而从此以后,鲁迅的著作,也把我吸住了!”<sup>②</sup>“一天,在普益阅报社,读到了鲁迅的《故乡》。我一下就被那弥漫全篇的抒情笔调吸引住了,被小说结尾那诗一样的哲理性的警句征服了。从此,我就爱上了鲁迅的著作。我从他的著作中,受到启发,学会思索问题,探求人生意义和分析接触到的社会现象”<sup>③</sup>。1926年,沙汀到北京之后,将鲁迅的书一网打尽,尽可能全部都搜集起来进行阅读,鲁迅成为沙汀的偶像。

沙汀还阅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新办的各种文学刊物,“他还建议广泛阅读当时北京出版的几种刊物:《新潮》《语丝》《猛进》,乃至《现代评论》,以及一批有名的著作、译文,并告诉我购买这些书刊的地址”<sup>④</sup>。1926年在北京,沙汀独守旅馆,狂热地读着这些杂志和“北新”、“未名”两家所出的新书。

如果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接受影响了沙汀一生的政治选择,那么,对五四新文学的接受,则决定了沙汀的文化选择,开启了沙汀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对“启蒙主义”情有独钟,“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sup>⑤</sup>。郭沫若在《女神》中高扬自由的精神。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就是思想启

蒙运动在文学场域中的体现,沙汀在阅读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作家作品的同时,接受了思想启蒙的内容,而且这种影响渗透在他的骨髓之中,成了一种潜意识,沙汀本人未必意识到此。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沙汀在明确的政治意识之外,多了对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关注,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同时,始终又刻画着中国民众身上的国民性。

沙汀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情景是,底层人面对底层人受难时,发出开心的笑或者尖叫。沙汀的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中反复出现“俄国煤油快到了。哼,非常便宜!只等中俄会议成功,就快到了。……哼……”<sup>⑥</sup>,这些叙述展现着沙汀的政治立场,但尽管如此,沙汀也忘不了刻画“看客”形象,罗素躲让车子,将一个半老妇人的碗打烂了,车夫们都不做生意了,围在那里看,三四个“娘们”也围成半圆。他们笑着,还打着口哨。罗素躬身下去捡碎片,一只小脚踢向他的鼻尖,随后是一片洪亮的笑声和叫嚷,身边那孩子也张着嘴笑着。拾荒的小女孩被人撞翻了,仰躺起,手脚朝天,收荒人大笑起来,调戏说“看把尿罐子碰破啊”。<sup>⑦</sup>《没有料到的荣誉》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九·一八”事变,但一群人对“九·一八”毫无感觉,却在笑谈他们谁都不认识的三姨太,三姨太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空虚时的谈资。国难当头,店老板夫妇似乎国难与他们无关,只关心收钱。一个爱国人士跳江自杀,想借此唤起人们的爱国之心,但近视眼看到这则消息之后说,“唉,笑死人!——这个骗子!”,他把一张报纸扔在桌子上,又笑嚷到,“你们看那一面!——简直是一个大笑话!”<sup>⑧</sup>,爱国者的死成为了人们的笑话。《兽道》中没人同情魏老婆子一家的遭遇,反而“认真地鉴赏着,有的还拍着手掌来表示自己的满意”。<sup>⑨</sup>不时掀起一阵惊呼。魏老婆子的媳妇受辱上吊后,邻居“擤一擤鼻涕,然后摩擦着手掌,懒拖拖地告诉我说”<sup>⑩</sup>,

①吴福辉:《沙汀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61-62页。

②沙汀:《沙汀文集》第十卷,第38页。

③邓仪中:《沙汀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④沙汀:《沙汀文集》第十卷,第43页。

⑤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南腔北调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

⑥沙汀:《沙汀文集》第四卷,第17页。

⑦沙汀:《沙汀文集》第四卷,第56页。

⑧沙汀:《沙汀文集》第四卷,第48页。

⑨沙汀:《沙汀文集》第四卷,第283页。

⑩沙汀:《沙汀文集》第四卷,第281页。

邻居似乎述说着一件平常的事情。魏老婆子疯了之后，几个站在门口看街的女人，老远就皱眉皱眼，随即退进门槛里面去了。皱眉皱眼表现出对魏老婆子的厌恶。魏老婆子丝毫得不到同类的安抚与帮助，只能在贫贱百姓的谈论和注视中走向生命的终点。“笑”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内在体现出的是人心的冷漠、无聊，通过“笑”的描绘，沙汀批判了中国国民缺乏爱和同情以及空虚无聊的劣根性。

在《困兽记》等作品中，沙汀也揭示了中国人的奴性心态。《困兽记》中吴楣的痛苦不是源于自己对丈夫李守谦还有感情，也不是因为得知李守谦另有新欢，而是因为失去李守谦的宠幸而深感悲哀。《有才叔》中面对混乱不堪的战乱，巡逻队伍的搜查，有才叔哀叹“我真活够了”，三次感叹“真是，‘宁作太平犬’”，唯一愿望便是得到一张良民证。《轮下》向我们展现了旧式知识分子顾忌面子、畏惧权势、渴求苟安的奴隶性格。《还乡记》中，民工们不愿建造乡公所，但也只是躲避了几天，之后又来做工，因为他们知道只能逆来顺受，还安慰自己“退后一步自然宽”，农民不同意地强占他们的竹笋，但地主许诺给农民留下十斤后，农民们便立刻妥协。

沙汀的小说还揭示了中国人的愚昧。《还乡记》中的冯有义和其他山民很迷信，将老鼠看成带着某种神秘性的生物，认为家里没有老鼠就是没落的征兆。冯大生将抽烟当作医治疾病的手段。《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里，放映机坏了，乡民一致认为没有去敬太子菩萨。还有人补充佐证，有一个戏班子不懂规矩，演戏之前没烧一两柄钱纸，结果演目连戏时，一叉就把演刘十四的演员钉死了。大家都相信这是真的。

《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作品揭露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这似乎已成定论，但即使是在这类作品中，沙汀也有对人性弱点的揭示，尤其揭示人的自私和贪欲。《在其香居茶馆里》新县长借口整顿兵役，其实是以此为借口，中饱私囊。联保主任方治国“两眼抹黑，见钱就拿”<sup>①</sup>。《淘金记》里各个阶层的人之所以沆瀣一气、勾心斗角，实际上是人对于金钱的贪欲使然。政府官员国家意识缺失，私心泛滥，下层民众同样有私欲。《公道》中，两亲家为儿

子/女婿的抚恤金争吵，暴露出下层民众的贪婪和自私。《模范县长》则揭露了人们思想中残留的封建意识，“我”的叔父一定要“我”到官场上去染一水，钻一条路子出来。揭示了隐藏于国民意识深处的顽固不化的官本位思想，指出这种唯官为上的官本位思想正是滋生官场贪污腐化的温床。

如果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在祠堂里》里就不仅仅是揭露军阀的凶残，还包含着对自由的追求。从连长太太对母亲的时常抱怨，可以得知连长太太的婚姻是母亲为了钱包办的。连长太太和那位已经逃跑了的男性才是真心相爱。连长在卧室的咆哮和拳头，都不能改变连长太太爱所爱的人，直至被活埋。连长太太为了争取自由婚姻宁死不屈，体现出现代人对自由的坚持。连长将人活埋揭露的是人性的残暴。周围的人将一件残忍的事件当成闲谈的话题，而且很羡慕这位女性被连长供养着的生活，“‘拿到福享不来呵！’肉电报立刻表示了同意，声调里充满着羡慕，‘要吃有吃，要穿有穿，换个别的人么，恐怕屁股也是喜欢的哩’”<sup>②</sup>，邻居们的愚昧、冷漠展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部短篇隐藏着作者在后现代意义上的对于自由的思考，表现了觉醒者的孤独和生命的脆弱，批判了多数人的蒙昧，作品隐藏着深厚的启蒙主题。

### 三、双重影响下的创作特色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在文化等诸多方面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沙汀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沙汀的双重影响决定了他创作特色的形成。1936年周扬发表《现阶段的文学》，1946年何其芳与吕荧“关于‘客观主义’的讨论”的通信发表，周扬和何其芳都在鲜明的政治立场下肯定了沙汀对于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揭露，但他们也指出沙汀在小说中不能集中地、有意识地把握这个时代的要害或本质。1981年黄曼君发表《论沙汀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指出沙汀现实主义创作的缺陷和局限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却缺乏更为开广的政治幅度和更为深远的历史高度”<sup>③</sup>，对于沙汀的创作，他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理念在沙汀的创作中体现不够鲜明、深刻。而沙汀本

①沙汀：《沙汀文集》第四卷，第441页。

②沙汀：《沙汀文集》第四卷，第293页。

③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第248页。



人在其创作生涯中,至少主观上从来没有想到回避意识形态,他始终认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是反映现实和向往革命,而且始终将革命的倾向性视为自己参与革命事业的途径,也始终用革命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作品,“力求写出来的东西有利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同时坚持下去”<sup>①</sup>。这就出现一个悖论:沙汀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相背离,至少客观上没有完全达到沙汀的主观意图。周扬、何其芳、黄曼君共同认为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是沙汀由于“生活太狭窄”导致了“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主要应该从他的生活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把握生活的思想认识的高度上去找原因”<sup>②</sup>。但和其他左翼作家相比较,沙汀的生活实践并不比他们少,而且他的社会实践活动还比较丰富。显然使用生活的熟悉程度来解释这个问题是不够的。原因或许是多重的,包括不能娴熟使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技巧,但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沙汀的双重影响导致的。

沙汀从事创作之前的党员身份以及革命活动决定了他创作的目的背负了非文学因素,带有严肃的政治目的和浓烈的政治色彩。而他所受的五四新文学尤其是鲁迅的影响,又让他保持着启蒙主义的理想。在沙汀的内心深处,文学、革命和启蒙相互纠结。理性的端口,沙汀是想借助文学参与革命,但在实际的创作时,潜意识支配着沙汀时常不忘启蒙主题。沙汀担任过“左联”的常委会秘书和小说散文组组长,但他从未像蒋光慈等人一样否认过五四新文学的功绩。他的革命者的身份在严峻的现实社会中,迫使他在伦理和道德选择上做出革命意识和革命观念上的逻辑演绎。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在灵魂深处左右

着沙汀对现实的认识。于是在沙汀的文本中往往存在两种话语,显在的话语是革命叙事伦理,对此,沙汀倾注了大量笔墨和心血,从阶级的角度揭露黑暗政治,表现革命真理,体现着沙汀的政治倾向和对文学功能的定位。潜在的话语是思想启蒙伦理,这是沙汀无心插柳而柳成荫地对中国国民丑陋人性的描绘。两种话语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抵制。前者体现出一个革命党人的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后者体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国民精神的现代性关照。沙汀对政治的不懈追求阻碍了他对启蒙主题的深度挖掘,而他对启蒙主题的有意或无意的表达又解构着他对于政治描写的整体性。这就形成了沙汀作品政治主题不够鲜明,而人物性格也不够深厚,个性也不够突出的缺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扬、何其芳和黄曼君等评论者都感觉沙汀作品的政治色彩不够浓郁了。

不过,虽然五四新文化对沙汀形成的双重影响让他在政治和启蒙之间摇摆不定,造成沙汀创作的某些局限。然而,局限也蕴含着特色。革命叙事伦理和启蒙思想伦理并非水火不相容,相反,它们是可以交融得天衣无缝的。这两种话语在沙汀的作品中时常处于相互调和与相互折中的状态。沙汀作品中对统治者的揭露、批判常常是与剖析国民的愚昧、落后相结合的,而且结合得很巧妙,惟其如此,取得了针砭时弊与思想启蒙的双重功效。在沙汀的小说中,既有对人物的阶级性评价,也有对人性的挖掘。既有对社会黑暗的批判,也有对大众的思想启蒙。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将政治革命和民族性格的改造、重建相结合,这或许正是沙汀的创作特色和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王锦厚)

①沙汀:《沙汀文集》第七卷,第104页。

②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第249页。